

1921-2011 建黨90年

風雨同行九十年 中共領袖與大公報人

長期以來，中共領導人將「不黨」作為辦報宗旨的《大公報》人當成朋友，坦誠相見。他們不僅密切關注《大公報》的新聞報道和時事評論，而且不時做出十分精彩的回應。

李淨昉

1941年5月21日，《大公報》刊登了王芸生撰寫的《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一文。該文站在軍事戰略的高度，剖析了晉南的抗戰形勢，同時援引外界對於十八集團軍的猜測和懷疑，大聲呼籲各路軍隊團結合作，共禦外敵。讀罷此文，周恩來立即致信張季鸞、王芸生，一方面讚揚《大公報》人的愛國之情，另一方面反駁了關於十八集團軍和中共的謠言，表明了堅持抗戰的決心。緊接着，張季鸞於5月23日發表了《讀周恩來先生的信》，在贊同其觀點的同時，更由衷希望毛澤東能來重慶，與蔣介石徹底討論幾天，只要「對於國家前途的基本認識能真實成立一致的諒解，則其他小的問題皆不足障礙合作，而這種團結抗戰的新示威，其打擊敵人的力量比什麼都偉大」。

周恩來登門會胡政之

除了互通信函，中共領導人甚至親自登門拜訪，與《大公報》人展開交往。當胡政之在重慶居住時，一天，他的兒媳黃敏忽然聽見有人輕叩玻璃門，開門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因為見到的是一副她既尊敬又熟悉的



張季鸞 (1888年—1941年)



胡政之 (1889年—1949年)

面孔。她還是禮貌地詢問了客人的姓名。客人自答「姓周」，並從西裝上衣口袋裡取出一張名片，繼續說：「我叫周恩來。胡先生在家嗎？請通報一聲。」胡政之聽見通報後，忙請其進屋。隨周總理而來的還有王若飛、葉挺和秦邦憲。就在胡政之的家裡，中共領導人與《大公報》人進行了輕鬆愉快的交談，「客廳裡時起時伏傳出爽朗大笑聲和談話聲」。

中共領導人還熱情地接待來到延安的《大公報》人，使他們感到賓至如歸。儘管通過《大公報》的詳盡報道，讀者已對中國的西北角有所了解。但受國民黨政府封鎖政策的影響，外界對共產黨人的革命根據地——延安的認識還是非常有限。因此，赴延安採訪，便成為許多《大公報》記者的心願。在延安，他們每每感受到中共領導人的善意與配合。毛澤東多次愉快地接受《大公報》記者的訪問，詳細闡述共產黨關於全面抗戰的主張。1937年冬天，孟秋江作為《大公報》記者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接見。1944年6月至7月，孔昭愷代表《大公報》參加中外新聞記者參觀團，到延安訪問。毛澤東在宴請記者團時，請他坐首席，並舉杯對他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孔昭愷在延安還進行了深入採訪，最後完成了長篇通訊《西北紀行》，於1944年7月29日至8月6日在《大公報》重慶版連載，呈現了延安的一些側面。

毛澤東親臨大公報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吳鼎昌馬上向蔣介石進言：邀請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因此，他起草了給毛澤東的「寒電」：「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如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與勿吝駕」，並於8月14日拍往延安。他隨即把電稿交給《大公報》重慶版，率先告知天下。這一消息發布後，國民黨官方新聞機構中央社和蔣介石的秘書陳佈雷都感到十分丟臉。中央社雖然很不滿意，但是經過證實，不得不播發這一消息。為了制止內戰，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人接受邀請到重慶和國民黨進行談判。8月16日，王芸生撰寫了社論《日本投降了》，熱烈讚頌毛主席到重慶商談國是乃「喜上加喜」。9月18日，周恩來還帶着延安生產的小米、紅棗等土特產品，親自到他家中探望他。雙方暢談《大公報》的出版發行，編輯採訪，以及天津南



▲毛澤東1944年在延安會見中外記者參觀團，毛澤東左側為大公報記者孔昭愷

資料圖片

開學校的一些往事。9月20日，毛澤東在約見王芸生和曹谷冰等人的時候，對《大公報》的基本狀況也進行了一些了解。當晚，王芸生代表《大公報》在報館內的「季鸞堂」設宴款待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代表團成員。同日，在重慶紅巖新村中國共產黨中央南方局辦事處，王芸生、王文彬、孔昭愷還受到過毛澤東的接見。

「《大公報》人都有一種強烈的事業心。」這是周恩來給予《大公報》人的讚譽。對於那些出類拔萃的新聞人才，中共領導人十分重視。其中有些人在日後還被委以重任。周恩來就十分欣賞楊剛所表現出的卓越才能。後來，在他的領導下，楊剛利用《大公報》編輯和記者的公開身份，從事國際統戰工作，卓有成效。新中國外交部建立時，周恩來又任命她為外交政策研究委員會秘書。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她曾作為總理辦公室的主任秘書，具體處理有關朝鮮問題和國際事務。此後，還一度主持中宣部國際宣傳工作。正是出於對《大公報》在新聞界地位的肯定和對輿論宣傳工作的重視，中共領導人鑒而不捨、誠心誠意地向《大公報》人分析時局的變化，闡釋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最終為共同的事業，使《大公報》發揮更大的作用。



▲1982年12月，鄧小平會見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

資料圖片

誕生於1902年的《大公報》以敢言聞名，大膽針砭時弊，指斥權貴，表達民聲。新記《大公報》進一步展現出獨特的媒體價值，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認同。於是，幾位旨在謀求國家民族光明未來的共產黨人的命運與《大公報》緊緊交織在一起，承擔起黨員和報人的雙重使命。

抗戰時期，《大公報》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不僅義無反顧奔赴前線，及時發回戰地報道，而且充分發揮各自的語言和專業優勢，深入分析抗戰形勢。曾在日本留學的李純青回國後，在《大公報》上海版任日文翻譯，之後又為《大公報》香港版撰寫有關日本的社評和專欄文章。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作為《大公報》重慶版的專職社評委員，深入分析日本人事變動情況。

值得關注的是，一些《大公報》記者在採訪、報道抗戰的過程中，逐漸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並最終接受了共產主義信仰。孟秋江，這位與范長江齊名的記者，以撰寫精采的戰地通訊而聞名。「七七事變」後，他作為《大公報》記者，深入華北各主要戰場，親身經歷平型關、徐州、中條山等戰役。採訪堅守太原的周恩來及其在延安與毛澤東主席見面的經歷，更給他留下了難忘的記憶。此後，他在報道抗戰真相、宣傳全面抗戰政策、掩護進步文化工作者安全轉移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並於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對共產黨人而言，《大公報》不僅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自由開放的宣傳政治理念的輿論空間，而且當他們因參與政治活動而遭遇危險時，《大公報》的及時救助又使他們能夠涉險過關。1934年，在《大公報》工作的吳碩農因散發傳單，被暗探跟蹤，而共產黨天津地下組織也遭到破壞。他向胡政之提出希望到日本躲避一時。胡政之不僅派其赴日留學，而且還請他兼任《大公報》駐日本特派記者，每月月薪給他60元。

在履行報人職責的同時，《大公報》中的共產黨人竭盡全力為組織提供實際的幫助。李光詒通過親屬得到了國民黨軍隊防衛天津的兵力配備圖及軍隊調動情況的機密情報，通過秘密渠道及時送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指揮部，為解放天津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解放天津戰役中，他說服兵站司令孫銜樹拒不執行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炸毀軍事工廠、倉庫以及各種設施的命令。

傅作義的女兒傅菊是《大公報》的一名普通編輯，1946年，提出了入黨申請。在組織的委派下，她日夜勸說父親，最終使得傅作義接受和談條件，實現北平和平解放。

為了使《大公報》發揮更大的輿論導向作用，共產黨人向總編輯王芸生耐心地宣傳中共的政策，使他最終消除了疑慮，接受共產黨的誠意。王芸生和李純青致電天津、重慶、香港《大公報》人到上海開會，決定由《大公報》香港版首先表態，逐步確立公開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全中國、徹底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立場。此外，楊剛、徐盈、胡邦定等人參與了天津《大公報》改組工作。

回望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可見《大公報》既記錄、見證了中國共產黨所創造的輝煌，又由幾位同時也是優秀新聞工作者的中共地下黨員活躍其中，引領社會輿論，把握輿論機關的走向。

大公精英中的地下黨員

侯傑 李淨昉

一宵夜談改變范長江人生

侯傑

在《大公報》報人群體中，與中共高層有過各種各樣交往者為數不少，范長江就是其中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交往經歷因此而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

關注中國西北角

1927年，接受革命思潮影響的范長江加入了賀龍領導的20軍學生營，投身南昌起義洪流。從此，他格外關注中國革命力量的發展、變化。為了到中國西部去近距離了解紅軍、認識紅軍，他以《大公報》旅行記者的名義，於1935年7月遠赴川北、甘南等地區進行了為期10個月的考察採訪，行程6000餘公里，撰寫了大量的旅遊通訊，如《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長安之管》、《毛澤東過甘入陝之經過》等，並陸續在《大公報》上發表。這是《大公報》第一次公開報道紅軍的偉大壯舉，展示了紅軍長征的部分實況。後來這些文章編入《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出版。在幾個月內，該書連續再版7次，擁有眾多讀者，社會反響強烈。

「西安事變」發生後，范長江獨自進入西安，意欲了解事實真相。1937年2月4日下午，他克服了重重困難，終於在楊虎城公館見到了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周恩來的一番肯定，徹底打消了范長江的顧慮。周恩來說：「我們紅軍裡面的人，對於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係，我們很驚異你對於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次日，周恩來和范長江進行了長談。周恩來不僅介紹了中共西北軍的聯繫，而且分析了中共在「西安事變」及其解決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問題。當范長江提出去延安採訪的請求後，周恩來一口答應，並要派車護送。

與毛澤東密洞夜話

2月9日，范長江在博古、羅瑞卿等人的陪同下來到延安。街頭貼出了「歡迎長江先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標語口號，迎接第一位深入陝北根據地進行採訪的國統區新聞記者。而他也馬不停蹄地採訪了包括朱德、葉劍英、林彪、廖承志、丁玲在內的11位中共領導人和知名人士。當晚，他走進了毛澤東的窯洞，談了一個通宵。後來，他深情回憶起這次採訪，並說：「在延安，毛



▲1951年10月，毛澤東與范長江交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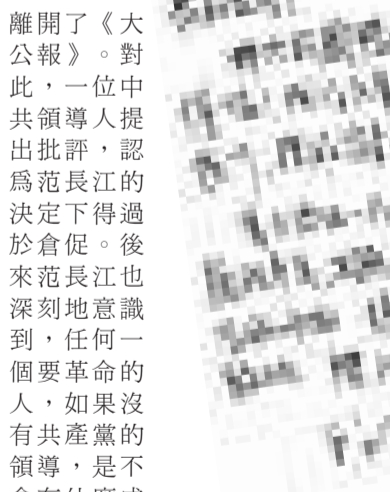
資料圖片

主席教導我一個通宵，這十小時左右的教導把我十年來東摸西摸而找不到出路的幾個大問題全部解決了，我那天晚上之高興，真是無法形容，對於毛主席的敬愛心情，由此樹立了牢固的根基。」在談話中，范長江受到毛澤東的啟發，明白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問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係問題、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找到了中國的路。

如沐春風的范長江流露出希望留在延安，收集更多資料，撰寫長篇著作的打算，卻沒有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毛澤東認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利用《大公報》及其各種可能的辦法，宣傳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動員全民團結，一致抗日，所以建議范長江馬上趕回上海，作宣傳工作，寫書可以以後再辦。范長江回到上海以後，立即提筆撰寫《動盪中之西北大變局》。1937年2月15日，該文在《大公報》上海版和天津版同時刊發後，毛澤東親筆致信范長江，深表謝意。「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後，范長江提出派《大公報》記者到山西採訪八路軍的要求，毛澤東立即電令彭雪楓：「歡迎《大公報》隨軍記者，尤歡迎范長江先生」。范長江的意見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加入共產黨行列

然而，范長江在《大公報》的工作於1938年遇到了比較大的挫折和打擊。年輕氣盛的他最終



▲毛澤東1937年給范長江的親筆信

離開了《大公報》。對此，一位中共領導人提出批評，認為范長江的決定下得過於倉促。後來范長江也深刻地意識到，任何一個要革命的人，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會有什麼成就的。因此，他產生了強烈的入黨要求，但對於自己是否具備或符合入黨條件，仍心存疑慮。1939年5月，他在重慶向周恩來提出了入黨要求，表達了自己要求政治進步、成長的迫切心情。周恩來馬上向位於延安的中共中央領導作了請示。一星期之後，范長江接到周恩來發給的通知，延安回電，批准他入黨。他坦言：「我那時的高興，真是無法形容的。他並告訴我，我在重慶歸他直接領導，在桂林，歸李克農直接領導。還給了我大約三四十元作為工作經費。從此我是光榮偉大的共產黨中的一個細胞了，我參加到偉大行列中來了。我的工作有黨給我指示方向了，不再是一個人瞎摸。」

此後，范長江與傅逸群等創辦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與胡愈之等創辦國際新聞社，向海內外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鬥爭和民主運動。1941年，與鄧韜奮等人在香港創辦《華商報》。1942年，香港淪陷，他轉移到蘇北解放區，先後擔任《新華日報》社華中版社長、華中新聞專科學校校長等職。1946年11月，范長江跟隨周恩來撤退到延安。這一時期，他擔任過中國共產黨駐南京代表團的發言人，以及延安新華通訊社總社的副總編輯等。范長江追隨毛澤東轉戰陝北，從事宣傳領導工作，一直邁着堅定的步伐，行走在中共領導的行列中。